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三期 ——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06d)

---

【史海钩沉】	李作鹏的“九一三”	余汝信
【回首往事】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江青	武建华
【当事者说】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张根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李作鹏的“九一三”

• 余汝信 •

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九一三”期间直接涉及林彪256号专机处置事宜的是吴法宪和李作鹏。据吴法宪回忆，他到西郊机场空三十四师指挥所前，已经周恩来的提点，知道256号专机违规调动。此后吴的所有行动，时时处处都请示过周恩来，故而，“九一三”后，他在此问题上未被抓到什么辫子。而丝毫不知内情的李作鹏，却被指为“两次篡改中央的命令”，“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此则成了“九一三”后李作鹏最重大的罪名。

1972年7月官方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声称：

“毛主席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十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

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九年后，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声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自1972年直至2009年1月去世前，李作鹏对此一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一直耿耿于怀，未停止过申辩。为对世人澄清事实真相，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将处理此事的全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

### 一、9月12日夜李作鹏的时间表

1、23：00，周恩来致电李作鹏。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

“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

“此时，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692—693）

背景：20：15，林立果和刘沛丰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海军山海关机场降落。22：30左右，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团负责人的电话称，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北戴河林彪住处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要他们查明究竟有没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此一背景情况，周恩来并未告之李作鹏，李对此毫不知情。

2、23：05，李作鹏询问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我问：‘你是谁？’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调度室值班主任。’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回答：‘20时15分。’我问：‘飞机走了没有？’回答：‘没有走。’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3）

背景：时山海关机场由海军管辖，番号为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所以，周恩来就满有理由拉着李作鹏“过问”此事。该机场历史上曾属海军一航校第一训练团驻训基地。1969年

7月改编为山海关基地场站，隶属北海舰队航空兵建制领导，代号9378部队，团级权限。1970年1月，山海关基地场站改称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隶属关系等未变。1970年2月，隶属师部驻辽宁锦西的海航五师（轰炸机师）建制领导。时场站政委史岳龙，站长潘浩，副站长王克湘、赵雅辉，参谋长佟玉春，政治处主任孙维茂。

此次通话，山海关场站有记录，基本上与李所说无出入。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

3、23：10—23：30，李作鹏报告周恩来，周作四点指示。

李作鹏称：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四条批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那就这样吧。’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

“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军情无小事，不能正确的接收、传达上级的指示，是要贻误大事的，因此现场核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高级指挥人员必备的素质。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3—694）

4、23：35，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恩来指示要点。

李作鹏称：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4）

背景：此次通话，山海关场站亦有记录。惟其记录为：“告诉你，它的行动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四个中间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记录影印件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两相对照，李的记忆恐有部分不准确，即李应无传达周恩来指示中的第一、二项，只传达了第三项。

5、约23：40—23：55，周恩来、李作鹏与机场间关于飞机编号的通话。

李作鹏称：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4—695）

背景：256号专机配置，252号是普通客机配置。机场方面听从空三十四师调度室的指令，对外将256号说成是252号，对李作鹏这位海军第一政委也不例外。李作鹏并不知其中奥妙，机场说是什么，他给周恩来报告的就是什么。

另根据场站电话记录，李作鹏了解飞机号码的时间为23：44，则周电话询问李飞机号码应早于此一时间。李回忆说“23点45分左右”有小误，应23：40左右为宜。

此前，23：30左右，周恩来已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叶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认北戴河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又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吓了一跳，赶快劝周不要来。（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页205）

周恩来在给电话叶群后又打电话给李作鹏，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再证实一遍叶群的话？

## 二、9月13日凌晨李作鹏的时间表

1、00：06，李作鹏主动再次与机场通话。

李作鹏称：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个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5）

背景：由于李作鹏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场站方面复述一遍，场站当时的记录为：“李政委：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

更大的背景是，00：00左右，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电话报告称，林彪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挡，已乘车从北戴河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李作鹏对以上情况毫无所知。

2、00：20，场站站长请示李：“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称：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在电话中并没有报告机场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他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自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何况这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5—697）

背景：李作鹏与潘浩上述通话内容，在场站记录中精简为：“潘站长又和李政委通话，指示：飞机放飞可直接报告总理。李政委同意站长和34师潘副政委讲一下。”（记录中不是“强行起飞”，而是“放飞”。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

潘浩应是一位有水平，有预见性的军人。惟他的问题，不仅李作鹏不好回答，即便他问到了周恩来，想必周恩来也是不能作主，周一定是要请示过毛泽东的。

话说回来，潘浩也不是完全凭预感。9月12日23：55驻场的空34师西郊机场调度

室主任李海滨已打电话给场站调度室，要两台加油车给256号飞机加油。23：56，场站调度室告之外场，两台加油车加油，化验员也到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此时，潘浩应已得知256号专机已在备航，而驻场空军的备航行动（不是放飞），潘浩是未被授权加以限制的。

潘浩的话灵验了。刚放下电话，00：32，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已经以极高的速度，开到了停机坪上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附近。

3、00：32—00：55 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后，场站与李作鹏、李作鹏与周恩来通话。

李作鹏称：

“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

背景：根据场站记录，“00：22李主任（余注：应指李海滨）告马上准备；00：23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00：32起飞了，报告××（余注：字迹、含义未清，但肯定不是李作鹏），陈联炳（余注：256号专机第一副驾驶员）还未上，找李主任；00：45 290° 75公里，政委（余注：指场站政委史岳龙）报告李政委”。场站记录并没有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强行起飞的记载。据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李万香1972年4月7日的说明，“在飞机强行滑出时，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同志向李作鹏作了报告。李答：‘好吧！就这样吧！’（这一情况是事后赵对我们说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8—79）

李作鹏称：

“以上就是从12日23时至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

“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出了什么事？机场雷达报告已向西北方向飞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为什么要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我的思想只围绕在总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当时，我最怕出现不安全问题，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责任范围内出问题。”（《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

4、约03：30，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李作鹏称：

“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秘书就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到大会堂后，政治局委员们都陆续来了。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总理报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经过”。（《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698）

背景：李的回忆录没有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的准确时间。

03：30是根据李作鹏称“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及《邱会作回忆录》中的“十三日凌晨

晨三时许”推断的大约时间，不一定准确。根据《邱会作回忆录》，他们大概等了近三个小时，于13日早上六时，“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大亮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91—792）

### 三、李作鹏关于修改电话报告记录的说明

对于1972年官方文件中指称“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及1981年判决书中指称“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等罪名，李作鹏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申辩式的说明。

李作鹏称：

“13日下午四点多，开完政治局紧急会议后，我回到西山。一下车，我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意指回海军）办公。’

……

“大约17时左右，刘继祥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这份报告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海航5师用电话报告，刘继祥秘书电话记录的。

“我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听听山海关机场的报告。我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他念到报告中记录着：23点35分，我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我点头说：‘对！’

“当他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我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我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我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此时已快18点了，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指示我们都“回家”办公，我通知刘继祥秘书，准备随我下山回海军。

“晚饭后，我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对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刘继祥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机场值班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责怪机场值班员。我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我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我看了这段报告原文以后，觉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意思。我没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时内，重复两遍完全一样的话，实际上，我这次的电话指示，就是对23点35分电话指示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因此，我将报告中我讲的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00—701）

经李作鹏修改过的山海关场站电话报告的值班日记影印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

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77可以见到。其中还可以看到李作鹏亲笔增加和删去的有关字句的字迹。

李作鹏接着写道：

“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誉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直到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四人联合指示’与‘一人指示’之间，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离。”（《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01—702）

惟198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对李作鹏进行庭审调查时称：法庭宣读了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给山海关场站传达周恩来的电话记录。23点35分李作鹏电话：“告诉你们，它（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周恩来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183）

周恩来10月9日的批示，等于说李作鹏传达错了周的指示，不管李是有意或无意的。这对李作鹏来说，不啻是致命的一击。惟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是在黄吴李邱9月24日被隔离审查半个月之后才作出这一批示的。而根据李作鹏的回忆，他修改电话记录是在9月13日，即李的修改早于周的批示大半个月。

#### 四、李作鹏的自我辩护

李作鹏在其回忆录第四十四章“自辩和沉默后的话”中，对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关于李作鹏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的三处最关键问题（一是“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二是“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三是“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分别作了阐述和自辩。

##### 1、关于“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

所谓李作鹏的“篡改”，就是将周恩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周恩来在电话里所作的四点指示中，到底有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明确表述？李作鹏称，“真相很简单：总理的电话指示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当时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平和，没有强调‘四个人一起’，更没有提到



‘命令’两个字”。（《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3）

## 2、关于“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

李作鹏称，“从始至终，包括场站站长潘浩在内的所有山海关机场给我的电话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机场有任何异常情况。潘浩‘强行起飞怎么办？’的报告有什么根据？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场站的推测？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更无法判断与确定。……当晚，在周总理与我多次通电话时，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采用怎样的办法阻止？周总理不作指示，谁敢擅动？我不敢决定，也无权决定”。（《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4）

李作鹏又称，“据我所知，专机强行起飞的当时，山海关机场场站对256号专机没有提供必要的塔台指挥系统、通讯系统，也没有打开必须的跑道照明系统。事发九个月后的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这样说：‘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没有塔台指挥，没有通讯保障，没有跑道照明，这么专业的禁飞状态，这么明确地要求专机飞行员停止起飞，就是采取的阻止起飞措施！怎么能说‘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4—785）

## 3、关于“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称，“问题的关键是，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李万香根本没有听清楚我0时06分的电话指示，而只是将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重新追记一遍，这样就完全不符合我在通知时讲话的原意了。对不准确记录我的话，我不仅必须要修改，而且有权力修改。何错之有？将不正确的电话记录改为正确的，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在掩盖什么‘罪行’？”（《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5）

接下来，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阐述了他对自己处置林彪专机一事的七点认识和想法。笔者认为，在七点认识和想法中，有两点即第二点和第四点尤为重要。

其中第二点是，“我希望所有关注‘九一三’事件的人们注意：林彪的三叉戟飞机是强行起飞的！不是‘放飞’的！当时不要说‘四个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机场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突发的、不正常的和出乎意料的！是我无法控制的！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不起作用，场站禁止起飞的专业措施也不起作用，难道专机强行起飞的责任就应该由我来负吗？”（《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6）

第四点是，“我为什么要放林彪逃跑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去何方，更没有任何情由放林彪外逃苏联。我也可以断定，黄永胜、吴法宪也决不会放跑林彪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林彪如果有反毛主席的举动，我们不会跟着跑。事后，毛主席怀疑我们，是因为他自己丧失了自信。”（《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6）

可以为这第四点作点佐证的是黄永胜、吴法宪对林彪跑了的态度。

1971年9月17日，邱会作到西山9号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邱会作说，“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邱会作回忆录》，下，页802）

吴法宪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在西郊机场空三十四师指挥所，一直在雷达监

视器前关注着256号专机的动向。“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864）

即使抛开是否忠于毛泽东不谈，纯粹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林彪主动出逃，对黄吴李邱一点好处也没有，更不用说“协助”林出逃了。那么干，协助的人马上就成了阶下囚。林彪不走，毛泽东可以冷落林，可以“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也可以削黄吴李邱的权，但怎么也会对黄吴李邱作适度的拉拢、安排，以图最终孤立林。毛泽东也正在这么干。据知情人称，1971年8月间，黄吴李邱作为政治局委员，都看到了关于将在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中央传阅件。其中，吴法宪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胜将是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邱会作、李作鹏也将成为副总理。黄吴李邱有什么理由要抛弃已到手的功名，主动选择做阶下囚呢（当然，后来结局是没有协助林，也被动成了阶下囚，但这也证实了有林在和无林在之根本区别）。

## 五、周恩来的角色与责任

《李作鹏回忆录》第四十四章有一节“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其阐述的要点是“九一三”林彪叛逃“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的，应该是周恩来。“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1）

李作鹏所说并非没有道理。惟笔者倒认为，更深入的观察可以发现，“九一三”的最大责任人，应该是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开始离京南巡，9月12日返抵北京。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矛头直指林彪。这些话，无论毛要怎么保密，也会传到林家耳中。这些话，无疑促使林家（尤其是血气方刚的林立果）最终与毛产生思想决裂，也促使林立果、叶群下决心避免重蹈刘少奇的复辙（刘少奇在监禁之下于1969年11月12日死于开封）。

毛泽东的是些什么话呢？

如毛称，“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余注：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周、康生），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三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余注：诬指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九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至于周恩来，不过就是助纣为虐。

1971年4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在这次会议结束的4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了“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周恩来又说，“这些同志自以为是在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把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忘记了，因而被陈伯达所利用，就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在庐上会议上，陈伯达继续挑动。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囿于宗派成见，受其影响，有的还进行宗派活动。”（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1971年4月29日）

周恩来代表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等于也是给林彪下了结论。正如高文谦所言：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从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版，页338）

9月12日22：30左右，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处接获林立衡提供的信息，得知北戴河林彪处情况有异。周有点半信半疑但也不得不要有所提防。为此，他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查询256号飞机的调动情况，得知确有其事后，又即向李作鹏下达了四点指示，其重点在于“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周似乎没有将该指示同时告之黄、吴，按道理他应这么做。吴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周同意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但周无对吴说要有四人的指示才能放飞）。周的这一指示，表面上安全稳妥，万无一失，实则正如李作鹏所言，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从周无预先告之黄、吴，也可看出周根本不想执行）。周下达这一指示，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作祟——万一有什么闪失，黄、吴、李也一并承担，对毛也能有所交待。

林立果、叶群（还有林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绝态度，是毛、周作梦也料想不到的。有研究者说，毛南巡讲话是敲山震虎。没想到虎一口气跑出了中国。这决非是毛想要得到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批注，反映的就不仅仅是周的自保求存的心态，而且更有落井下石的成份在里头。256号专机是强行起飞的，在这种情况下，四个人一起下命令与一个人下命令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下命令就是阴谋放跑林彪（其实谁也没有下命令）？四个人下命令就能挡得住？正如李作鹏所言，“当时不要说‘四个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周作批注时，黄吴李邱都已成了阶下囚，何必再落井下石，踩上一脚？话说回来，为了自保而牺牲他人，估计在周的一生中，这也不是第一次吧？！

至于李作鹏，他对周恩来在“九一三”凌晨所充当的角色，还有更深一层的疑惑。李作鹏称：“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象叶群所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0）

李作鹏再称：“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地全面情况告诉我（总理告诉我的情况还不如告诉吴法宪的多），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是退身之策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0—791）

李作鹏最终的疑问是，“当然，他（余注：指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真拦’还是‘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2）这就涉及到毛、周在“九一三”中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失策还是阴谋，是疏忽还是故意。惟笔者认为，仅根据目前现有的公开材料，尚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判断为后者。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不无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至少为未来的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索课题。（2011年7月）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参加2011年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研讨会而作。原计划收入启之、何蜀编的《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记忆与思考》。由于该书收录了作者另一篇文章，故本刊全文刊出此文。）

~~~~~

## 【回首往事】

###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江青

• 武建华 •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同年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这说明在毛主席的主观认定上，已开始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了。

◇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叫嚷：“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贯用的伎俩，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堂皇的题目作他们卑劣的文章。1974年初，他们以“批林批孔”为名，四处“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再次兴风作浪，攻击周总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政、军领导人，妄图整倒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以实现他们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

1月13日，江青把迟群、谢静宜等人找去谈话，派他们分别到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国防科委及中国科学院、中央联络部等领导机关送信、送材料，宣讲“批林批孔”，大造政治舆论。她还专门指令负责她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带人住到北京军区某部六连和八连，督促他们开展“批林批孔”试点活动。

在此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还在军队地方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作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还说，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王洪文在总参谋部讲话，要求揭开总参的“盖子”。他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他还诬蔑总参作战部是“维持会”。他说：“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陈亚丁即擅自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讲话，布置在部队“放火”，“夺权”。他说：“江青同志要我回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就这样，江青一伙夺了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不仅如此，江青还变着法推销她那一套“批林批孔”的货色。1974年1月22日晚（农历除夕），江青请外交部的乔冠华、章含之、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等7人到钓鱼台17号楼，说是过年吃饺子。到后他们发现迟群、谢静宜也在场。吃饭中间，江青提出要迟、谢到外交部宣讲“批林批孔”。江青说：我给你们送去两个“批林批孔”的炮手，你们敢不敢要？她和迟群一唱一和，要当时在外交部主管政治工作的仲曦东同意迟、谢于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到外交部“宣讲”。当时唐闻生问迟、谢要宣讲什么内容，但迟、谢不肯透露。江青还说，她要写一封介绍信，届时由迟、谢带到外交部。

外交部核心组的几位同志回到部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江青这样做和毛主席此前对外交部的指示不相符。于是，决定由王海容当夜往毛主席那里打电话，把有关情况报告主席，并请示可否推掉迟、谢到部里来“宣讲”。1月23日下午，主席那里回话说：可叫迟、谢待命，什么时候去等通知。王海容又问：可否将主席的意见告诉江青？答复是：不要告诉她。

据此，王海容于1月23日夜打电话给谢静宜，说明外交部核心组根据此前毛主席的指示已另有安排，请迟、谢过些时候再来。谢静宜当即表示同意，并答应由她向江青作说明。谢还说，江青要她和迟群带到外交部的介绍信还没有交给他们。

不料，1月24日傍晚，江青那里却突然给外交部打电话说，江青要外交部核心组立即把全部人员召集起来，让迟、谢当晚“宣讲”，他们两人已在江青处等候随时出发。王海容即把对谢静宜讲过的理由又重申了一遍，并说近来外交部的外事活动很多，而且春节放假期间，临时召集人员也有实际困难。但江青根本不听，坚持要照她说的办，还说主席的布置先放在一边。外交部的同志听后很是生气。核心组决定对她采取拖而不复的办法。过了一阵，王海容向江青处的工作人员了解，得知她已带迟、谢到剧场看戏去了。这件事就这样拖过去了。但江青对此显然并不会善罢甘休。

江青一伙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派人外出“宣讲”等做法炒作得沸沸扬扬。毛

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制止他们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文件的。”

1974年1月24、25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请示毛主席，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接连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在江青策划下，迟群等在1月25日的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前，江青还对迟群等讲了许多攻击、诽谤周恩来的话。

在迟群、谢静宜讲话过程中，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不断插话，点了党和国家及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名。江青不满地说，外交部说是有外事活动，两次挡驾，不让迟群、谢静宜去“宣讲”。江青说叶帅有个女儿“走后门”到外语学院学习，要外交部查清此事。他们还把郭沫若叫到大会会场，三番五次地点名批判。江青一方面称应“保护”郭，另一方面又指责郭的《十批判书》。

在这天大会上，迟群还点了外交部领导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说那里有个学生是“走后门”入学的。江青在攻击叶帅时，也曾说这是外交部的一个错误，核心组应立即让她退学。此事后经外交部调查核实，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写了一个否定江青、迟群指责的报告，上呈周恩来总理。

1月27日晚，江青一伙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有即将结业的某期中央读书班的学员和即将派往外地的一批记者参加的会议。姚文元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不时插话。

江青说：“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进展不平衡，“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同“中央”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大发淫威，找茬整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

首先，江青明知故问地喊：“总政治部田维新来了没有？”

田维新从座位上站起来答话：“到！我在这里。”

江青突然问田维新：“你说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没有作出回答。

江青又追问：“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田维新声音不高地说：“好像是184……”

江青斥责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像话吗？”

田维新带着检讨的口气说：“我没有准备，我学习得不好……”

江青提高嗓门喊：“什么学习不好？你还跟我顶嘴！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从门外进来两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和帽徽。

田维新见江青不怀好意，已有了思想准备，抬起头，不卑不亢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

江青这出人意料的无理行径，震惊了全场的人。大家以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接着，江青又大声吆喝：“《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愣了一下，一时也答不上来。后来轻声说了个“1871年”，但未说出月日。

大家都为华楠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江青的威风也许要得差不多了，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就让他坐下了。

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有人说田维新、华楠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报复，制造冤案。

◇ 汪东兴等人将会议情况面报主席。主席细听大会录音，怒斥“形而上学猖獗”，严令“录音扣发”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参加了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大会，心里一直不踏实。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毛主席住处。

主席问：“有事吗？”

汪东兴说：“这几天接连开了几个会。”

主席问：“什么会？”

“主席不知道呀？”汪东兴心里想，“这么大的事，主席怎么会不知道？”

主席见汪东兴一时没有回答，连问：“什么会呀？怎么开的呀？”

汪东兴就把1月25日会议的经过、会上的发言内容简要地作了汇报。

主席听完汇报说：“怎么‘走后门’也成了林彪、孔夫子的人？”

1月24日和25日大会以后，江青一伙在他们的住地钓鱼台组织人突击整理大会录音。工作人员告诉汪东兴：大会时，他们有一段插话没有录进去，整理时要补录进去。忙碌了3天，录音整理好了。姚文元又起草通知，准备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播放，企图搞乱全国。

正在他们忙着复制录音，起草文件的时候，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因会见外宾来到了钓鱼台。

江青见到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后，颇为得意地说：“1月24日和25日大会的录音正在抓紧复制，我们要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国，很快就要发出去。‘走后门’的问题，你们外交部也要作检讨。”

王海容、唐闻生都参加了1月25日的大会，现在江青又要把大会录音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国，她们认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沉默，应该报告毛主席。

在钓鱼台的外事活动完了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就驱车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她们见到主席后的第一句话就说：“他们要把大会录音搞到全国去！”

“什么会的录音要搞到全国去？无头无尾嘛！”

王、唐把1月25日大会的情况又向主席讲了一遍，接着急切地说：江青他们在钓鱼台那儿复制1月24日和25日大会的录音，他们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去。

“发到全国去？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不经过我批准，能行吗？”

王、唐：“江青亲口对我们讲的，很快就要发出去。”

主席问：“你们能不能找到录音？”

王海容：“我们拿不到。”

主席：“你们问问汪主任，看他能不能找到？”

王海容从主席那里给汪东兴打电话，把主席的意思告诉了他，并问他能不能找到大会的录音带。

汪东兴对她说：“请你报告主席，大会的录音带可以找到。待我拿到手，马上就给主席送去。”

大会的录音是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在开会时录制的。其中一位同志感到把大会录音发往全国而不经中央办公厅下发，这种情况不正常，于是背着江青一伙偷偷复制了一份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拿到录音带后马上就送给了主席。

毛主席从头到尾仔细地听了录音后，非常生气，使劲地拍打着椅子扶手说：“形而上学猖獗！”“两个大会不经政治局讨论，随便发号施令！”他当即决定：“大会录音扣留，不准下发！”

江青听说大会的录音被主席扣留不让下发，简直急疯了，到处追查是谁透露风声给主席的，最后竟追问到主席那里。

主席见到她，没好气地说：“录音我听了，不能发，是我扣留了。你们不要搞了，复制的录音一律销毁。”

就这样，1月24日和25日两次大会的录音才未能流毒全国。江青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恨得咬牙切齿，又是敲桌子，又是打板凳。

中央办公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他们在钓鱼台复制的那批录音带全部销毁，现在留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只有毛主席听过的那一套。

此后不久，毛主席收到叶帅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孩子到外语学院读书的事。毛主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并得知北京许多领导同志就“走后门”的事纷纷作检讨，搞得人心惶惶。2月15日，主席在叶帅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主席作出上述批示后，请周总理将其连同叶帅的信一并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有关部委。收到文件的同志和单位都非常高兴，立即组织学习，并要求将此件发往全党全军。外交部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姬鹏飞、乔冠华、唐闻生等，当时就联名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把党内高层领导的呼声，分别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报告。随后中央发出1974年8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关于“走后门”的问题，中央通知放到运动后



期解决。

江青一伙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不满，恶毒攻击周总理，说他“故意泄密”，“打击革命小将（指迟、谢）”等等，寻找各种借口要中央办公厅将已经发出的文件收回来。后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得知文件是毛主席让发的，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江青在受到主席批评后，又改口请主席再为“批林批孔”作指示，以求挽回些体面。毛主席拒不相见。3月20日，气愤之下的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 “《中国》事件”、“蜗牛事件”怪事频出。迫不得已，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四人帮”敲响了警钟

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几桩古怪的事件。

1974年1月，在周总理主持下，政治局曾几次找外交部核心组的一些同志研究国际问题。在一次会上，谈到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中国》。江青见有机可乘，又借题发挥，大叫大嚷地说：该片问题严重，要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批。她提出可在《纽约时报》买版面登广告批。江青还在会上口出狂言，要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外交部等有关人员戴“汉奸”帽子。最后，经查明事实，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江青的意见。

会后江青等人还不罢休，他们在钓鱼台17号楼看电影时，还大骂电影《中国》是“汉奸加间谍”搞出来的。江青说她现在把“汉奸”帽子拿在手里，给谁戴上还没有定。她说，她已经叫文化组和宣传部门组织文章在报纸上批判该片。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依照江青一伙的布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一时间新闻媒体大加炒作，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

在这前后，江青一伙还从外交部等单位要去了一些外国人来华拍摄的其他影片，想从中找到类似的问题做文章。有一部英国人拍摄的《红地毯》，江青一伙在钓鱼台17号楼看了。影片一开始有一幅地图，没有标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所标颜色与大陆不同。他们就责骂有关人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拟公开放映，是“饭桶”。后经外交部了解，有关同志审查该片时已经提出了地图的问题。江青等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炮制了一起“蜗牛事件”。为了发展我国的电子工业，1973年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彩电显像管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负责人批准。当时江青等人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回国时，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在“批林批孔”中有一好事之徒却写小报告给江青，以有所图。江青正愁缺乏攻击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的材料，于是如获至宝，立刻抓住此事，作为重型炮弹攻击国务院。

2月10日，江青亲自跑到四机部作煽动性的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

周总理要有关部门查明事实真相。国务院外事部门专门召开了会议，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核心组成员唐闻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阐明：经调查，按当地风俗，蜗牛是节日礼品，象征幸福、吉祥，并无恶意。外交部核心组两位成员还当面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不是侮辱，不能提交涉。

毛主席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再次看到社会出现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4月10日，经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5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规定，要求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上；解放军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坚持正面教育。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同时强调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然而，江青一伙对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通知阳奉阴违，继续制造事端，致使许多单位领导班子重新瘫痪，工业生产下降。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出现了工业生产萎缩甚至倒退的严峻局面。

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让主席忍无可忍。7月17日晚，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主席还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批评他们搞“上海帮”。他手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此举挫败了“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的图谋，为后来彻底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本文作者离休前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

□ 《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

## 【当事者说】

###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 张根生 •

粉碎“四人帮”22年后，华国锋详细回忆当年的整个过程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

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该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

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残酷地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两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师，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的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

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

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10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

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20%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50%；征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

经验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作者张根生，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 《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